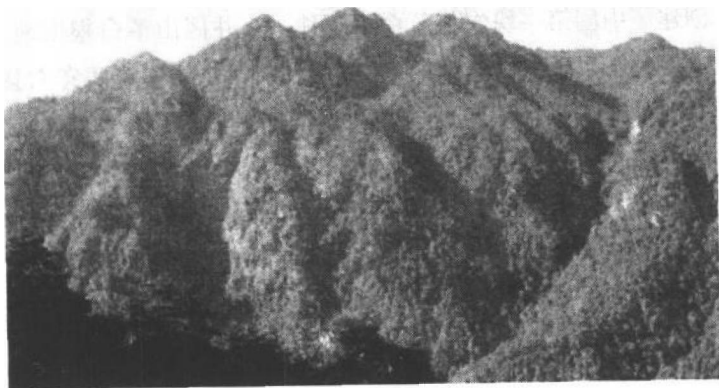


引 言



井冈山

在江西、湖南两省交界之处，有一条罗霄山脉，它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沿湘赣边界蜿蜒数百公里。而以江西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更是山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的绝大部分地方属于高山和丘陵地区，逶迤的山岭以其独特的走向，各自形

成雄伟的山岗。如宁冈的万洋山，永新的天龙山、万年山，莲花的武功山，遂川的江西坳，海拔都在 1000 至 1500 米之间，其中坐落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境内与江西交界的酃峰高达 2115 米。连绵的群山之间，分布着许多丘陵半丘陵盆地，土地肥沃，加上地处亚热带湿润性气候，使这一带盛产粮油，物产丰富。从高山间流出的泉水，汇成无数的小溪小河，形成丰富的水系。当然，由于地处偏隅，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在 20 世纪之初，这里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1927 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湘赣边界军民就是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块处于重重包围之中的“红色区域”，主体横跨两省六县一山，即江西、湖南两省，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等 6 县，以及井冈山。在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其面积达 72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50 余万，割据势力曾扩展到了江西的吉安、安福的小部分地区。受根据地的影响，江西万安、泰和，湖南桂东、资兴等县的边缘地区皆属根据地的外围屏障。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革命道路的起点。从 1927 年 10 月至 1930 年 2 月，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在井冈山这块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干出了开天辟地的一番伟业——

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缔造了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建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总结了中国第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开展了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

归根结底，井冈山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它开辟了一条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独特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朱德同志将井冈山称之为“天下第一山”；

彭真同志将井冈山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

敢问路在何方

● 不得已的退却

湖南省浏阳县的文家市，距县城约 50 公里，且与江西省的万载、宜春、萍乡搭界，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山区小镇。由于地处偏僻，从不为人所注目。然而，1927 年 9 月 19 日，由于一支军队的到来，使得它成为了中国革命史所不得不提到的地方。

这一天，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一队系着红布带的武装士兵，在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红旗的引导下，进入文家市。当地的村民早几天就听说有系着红布带的工农革命军在东门市一带与官军交火，还听说浏阳县城也被工农革命军占了。可没有料到这支队伍却如神兵般一下子来到了文家市。

自先头部队进驻之后，这一天，或成群结队，或三五一伙地又陆陆续续来了许多工农革命军的部队。

从 9 月 9 日开始秋收起义以来，这支称之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队伍，还从未集中在一起，3 个团分别从江西的

修水、萍乡、铜鼓出发,分三路向湖南的平江、醴陵、浏阳进攻,计划在夺取这三地之后,再会攻湖南省会长沙。然而,出师不利,一团因临时收编的邱国轩部阵前倒戈而严重受挫,连平江长寿街这样一个小镇都未能攻下。三团一鼓作气拿下了浏阳的白沙镇和东门市,却在强敌的反扑下损失惨重。二团先后趁虚攻占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却在浏阳县城内被反攻的敌军冲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情形之下,随三团行动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当机立断,下达了停止进攻长沙,到浏阳文家市会合的命令。

原计划攻入长沙城会师的 3 个团,没想到竟会在浏阳文家市这个偏远的小镇会师,而且是如此境况下的会师。

这不能说是胜利的会师。

没有兴奋,没有欢呼,只有暂时松一口气的感觉。

此时,集中到文家市的队伍只有 1500 人,与 10 天前发起暴动时的 5000 人相比,是大大的减少了。然而,在失利之后保存和集中起来的这一批有生力量,却是非常宝贵的,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对中国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在若干年之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的。

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前委的主要成员起义军总指挥卢德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第三团团长沙先骏,以及第一师的师部,是随一、三团的部队先后抵达文家市的。前委的另外两个主要成员师参谋长兼一团团长钟文璋、二团团长王新亚,则在战斗失利之后,私自出走,下落不明。

当晚,在文家市的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决定这支队伍命运的前敌委员会会议。

会议在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内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几位前委成员之外，还有一些师、团主要负责人，何长工、杨立三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列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领导人毛泽东

会议一开始，大家就围绕起义 10 天来的战斗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大家都是亲历者，对起义的发动及其取得的成效、战斗的失利和遭受的挫折，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认为：起义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及部署，顺利地发动起来，并且一度占领了醴陵、浏阳两座县城，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向世人宣告了共产党坚持革命的决心和力量；同时也在湘赣边界地区发动了工农群众，造成了革命的声势。当然，由于敌强我弱，敌情不明，加之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缺乏战斗经验，使起义部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未能实现攻占长沙的起义目标。

接下来讨论下一步“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时，前委委员们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起义的旗帜既已竖起，战斗又已经打到了这种状况，下一步部队往哪里去？如何行动？确实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还是后退，转战湘南？都需要立即作出抉择。因为，说不定明天或者后天，围追的敌军就会赶来。

前委委员们深感部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何长工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9月 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里的一个大教室开会。我和杨立三作为会议工作人员，有机会了解一些会议情况。会开了一整夜，争论得激烈。余洒度等人坚持打长沙，他认为不打长

沙就没有出路。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坚决反对打长沙，主张将部队转向山区和农村。在农村中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发展革命力量。他分析了形势后说，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变，不变就要吃亏。他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我们要到这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罗霄山脉北段靠大江，又有武汉三镇和南浔铁路，南段敌人调动也比较方便，都不好。中段，是两省结合部分，两省军阀有矛盾，各保其实力，我们有回旋余地。当时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命，革到山上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发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毛泽东同志的话，通俗易懂，包含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真理。卢德铭同志坚决拥护毛委员的主张，他说：毛委员讲得对。现在交通要道的城市不是我们占领的地方，如果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个别人如余洒度坚持错误主张。”

余洒度，当时的头衔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为秋收起义部队的军事指挥员，对部队有着较大的影响。

何长工的回忆详尽地介绍了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主退”派和以余洒度为首的“主攻”派的观点，而且看起来这两种意见的争论还相当激烈，因为这次会“开了一整夜”。最后，总指挥卢德铭提议举手表决，并率先举手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主张。于是，在多数人的赞同下，通过了“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的前敌委员会决议。

似乎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终于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清晨，嘹亮的军号声将 1500 多名工农革命军官兵召集到了里仁学校操场。从未见过如此“大场面”的数百名当地群众，也纷纷集聚到操场周围。一时间，里仁学校操场内外，人头攒动，人声喧哗。

当值日军官将队伍整好之后，身着蓝布长衫的毛泽东在卢德铭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队伍前边。虽说开会熬了一个通宵，但毛泽东仍然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当他满面春风地走向那张摆放在操场南边，作为临时讲台的课桌时，队伍中一阵骚动。

“毛委员来了！”

“毛委员要给我们讲话了！”

官兵中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毛泽东，但许多人对毛委员并不陌生，尤其是那些参加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人，对“农民运动大王”毛泽东更是久仰大名。今天，毛委员要讲话，大家自然非常兴奋。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兵们更想听听“有学问”的毛委员是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主意。

毛泽东挥了挥手，开始了他的演讲：

“同志们，工农弟兄们，我们这次暴动，是向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是要继续我们的工农革命！我们拿起了武器，公开亮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眼下，我们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到了一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简单的几句话，使官兵们因战斗失利而显得沉重的情绪变得轻松了许多。

接着，毛泽东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和革命前途之后，坚定地说：“我们的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

听到这里，官兵们兴奋起来。“小石头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多么生动形象的语言！多少年之后，有幸聆听过毛泽东那次演讲的一些人，仍然对这一句话有着清晰的记忆。

毛泽东当然也谈到了官兵们最为关心的部队去向问题：

“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我们的斗争策略也要变才行。还去攻打长沙吗？不行，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只有打垮了反动派，我们穷苦劳动人民才能翻身。当然，文家市也不是久留的地方，我们还得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

毛泽东的一席话，给官兵们以鼓舞，增添了大家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随后，部队离开文家市，按照前敌委员会的决议，朝萍乡方向实施退却。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旧址——湖南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

●退却不符合中央精神

部队沿着蜿蜒的山路，朝萍乡方向行进。

毛泽东随队而行，他的心情并未因前委会采纳了他的提议、部队正实施退却而感觉轻松。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别是作为中央派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特派员，毛泽东深知停止进攻长沙、率队退却，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余洒度是军事指挥员，他应该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会议上一味坚持要继续进攻，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

同志急欲对国民党反动派复仇、尽快夺取革命胜利的心态。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由得又一次问自己：放弃进攻，实行退却错了吗？！

毛泽东想到了前不久参加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当时，党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蒋介石于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总司令公开与共产党、与工农民众分道扬镳。

“总司令”挑了头，各地的新军阀纷纷遥相呼应。

4月15日，广州发生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惨案；

5月17日，武汉夏斗寅部叛变；

5月21日，长沙许克祥部制造“马日事变”；

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

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见之间的分歧，倒也不足为怪。可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掌握着军队，使分手充满了血腥。

短短几个月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工农运动的卓越领袖汪寿华、萧楚雄、熊雄、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

共产党员为此激愤，工农群众为此悲伤。

然而，共产党中央领导的表现却令全党失望。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而且当国民党反动派露出狰狞面目时，还一味地委曲求全、妥协退让。

6月30日，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步步紧逼之际，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了扩大会议，内容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共有11条。在会议讨论中，与会的一些同志对这个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决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年轻气盛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了一个批评这个决议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匆匆将意见书看了一遍，气得大发雷霆：“谁让你们搞的这个东西？”随手就将意见书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还气愤地用脚踩住。

任弼时见总书记生气了，连忙请求解释。

“什么都别说了！”陈独秀横蛮拒绝。

见此情形，其他同志不便再说什么。由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11条的决议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党中央又一次失去了领导全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的机会！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软弱退让，非但没能“感动”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党自身的生存，也为了挽救

革命。于是，就有了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就有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八七”会议会址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的一座公寓式房子中召开，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不引起注意，20多位与会人员都是由内部交通一个一个地带进带出，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可与会人员的一进一出，前后竟花了6天时间。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

纳滋及另外两个俄国人也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当时就在武汉，但他没有与会。因为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既受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又为共产国际所不满，会议之前就已失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权，罗明纳滋的前任鲍罗廷对陈独秀的安排是提议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会议有三项议程：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

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

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罗明纳滋的报告很长，连同翻译竟用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这个报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批判，旨在扭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这个报告的内容，经大会讨论，后稍作修改，即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从而结束了陈独秀路线对全党的领导。

瞿秋白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由此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瞿秋白的提议下，大会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三个议决案，成为了党的新政策。

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9 名：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 7 名：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

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提出了斗争任务及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行暴动，武装反抗。

《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中央的新决策，也反映了共产党内的一种情绪。时为中央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维汉后来曾回忆道：

“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也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

中共湖南省委对发动秋收暴动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暴动的目标很明确：“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为此，首先要夺取省

会长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而于9月9日举行的暴动，却未能实现上述预期目标。不仅没能夺取省会长沙，就是占领了的醴陵、浏阳县城，也很快就丢了，最后还不得不实行退却。

想到这些，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现在的退却，既不是省委的指示，也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他又记起了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的一段话：

“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远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

显然，现在停止进攻长沙，退往萍乡，是改变了暴动的计划。但这是不是说自己动摇、犹豫呢？到底是继续进攻会陷暴动于败亡，还是及时退却会陷暴动于败亡？

毛泽东仍在理着自己的思绪。

●毛泽东决定停止进攻

秋收暴动未能完全按照中央和湖南省委的预定设想发展。